

[主持人语] 随着公益慈善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公益慈善的研究开始兴起。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益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参与公益慈善的主体行为,即公民的公益慈善行为的研究仍较少。本栏目这期刊登的三篇论文,从个体的公益行为切入,探讨影响公益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其中王新松、赵小平的论文从公民的教育、收入、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探讨对志愿行为的影响;另外两篇文章则着眼于公民的捐赠行为,刘凤芹和卢玮静的论文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出发,南方、罗微的论文则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探讨对公民的捐赠行为有何影响。三篇论文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量化研究,对于我们从宏观了解目前公益参与和公民文化的现状、以及社会发展对个体公益行为的影响起到一定帮助作用。研究还有发展潜力和前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中国城市居民的志愿行为研究:人力资本的视角

王新松,赵小平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公益行为对于探索中国公民的公民性以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公民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健康状况三个角度,讨论人力资本对于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有37%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参加过志愿活动,而公民的各项人力资本指标对其志愿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公民参加公益活动的可能性越高,而健康情况与志愿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公民的经济状况与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成反比,经济状况越好的公民,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这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状况好的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公民在经济状况改善之后,距离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仍有一段距离。

[关键词] 人力资本;志愿行为;教育;收入;健康

[中图分类号] D6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3)03-0104-09

### 一、引言

随着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对公民志愿行为的研究(Salamon, 2002)。在中国,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及北京奥运会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公众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对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志愿服务在中国社会起步较晚,目前对中国公民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

一直以来,学者对中国社会研究的一项主要关注点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参与公民社会的实践有何变

化(Solinger, 1999)。传统上认为,生活状况的改善,如收入水平增加、受教育水平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会促进公民性的提高,表现为公民更多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Turner, 1993)。然而,学者们对这一结论也提出过挑战,例如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程度反而偏低(Tang, 2011)。对志愿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了解中国公民参与公民社会的窗口,尤其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公民生活改善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

对志愿行为研究一个主要方面是影响志愿行为的因素,学者们通常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

[收稿日期] 2012-07-13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项目“公共安全政策与社会稳定法治保障”。

会资本三个视角来解释公民的志愿行为(Wilson, 1997; Gratton, 2003; Haski-Leventhal & Bargal, 2008),其中,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结论争议较大。有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与志愿行为成正相关(Haski-Leventhal & Bargal, 2008; Bussell & Forbes, 2002; McPherson & Rotolo, 1996),例如,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越能感知到社会需求的存在、越具有公民意识,因此更容易有志愿服务的意愿和行动(Cuskelly, Taylor, Hoye & Darcy 2008)。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与志愿行为正相关。收入越高的人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加志愿服务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因此,其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就越低(Wilson, 2000)。

那么,在中国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吗?收入水平的增加会促使中国公民参加更多的志愿活动吗?公民的健康状况与其志愿行为之间有什么联系?本研究基于实证数据,对以上人力资本因素与公民志愿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 二、文献综述

志愿行为是指人们利用自己的时间无偿地为其他人、团体或组织谋福利而耗时耗力的行为(Wilson, 2000; 丁元竹、江汛清, 2001)。志愿行为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它创造物质价值或社会价值,所创造的市场价值高于任何对这种活动的补偿,正是对这种活动所带来的价值的心理期待,驱动人们产生志愿行为(Smith, 1981; Wilson & Musick, 1997)。志愿活动是志愿精神的一种体现,志愿精神是指“通过贡献服务、物品、钱财用以帮助实现一些预期的结果,并且不受任何强迫以及直接的补偿”,志愿行为与其他生产性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无偿的(Smith, 1981)。本文所关注的志愿活动主要是志愿服务,而非物品或钱财的捐赠。

人们参加志愿服务,或是根据兴趣选择志愿服务工作,是需要一定“资本”的,其中与个人相关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 Theodore Schultz 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人力资本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健康与保健状况等,而投资正式教育项目、在职人员的培训和各种学习项目、医疗和保健等都可以提

升人力资本的水平(张银、李燕萍, 2010)。Becker 将人力资本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普遍适用的知识和技能;另一类是专用性人力资本,是适用特定企业或产业的专用性知识和技能。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总是比教育水平低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人们通常用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三个方面来衡量人力资本,有时甚至仅仅使用教育水平来代表人力资本(Gratton & Ghoshal, 2003; 李培林、张翼, 2003)。而对于这三方面因素与公民志愿行为的关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苏方国, 2011),下文分别对相关研究进行阐述。

### (一)教育

一系列的国外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与人们的志愿行为成正相关的关系(Haski-Leventhal & Bargal, 2008; Bussell & Forbes, 2002)。例如,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就业领域越广泛,认知能力也越强。他们更能感知到社会需求,更具有公民意识,因此也更容易产生志愿服务的意愿和行动(Gesthuizen & Scheepers, 2012)。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美国的高中毕业生中,申请本科的学生比申请专科或者社区大学的学生更具有志愿服务的精神。

然而,根据交换理论,人们在决策之前会进行理性成本计算,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决定也不例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收入水平也可能越高,因此其参加志愿服务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导致他们可能越不愿意参加志愿服务,尤其是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技术含量较低的活动(Wilson, 2000)。

在国内的文献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志愿行为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青年人价值观的培养等方面的功能,且多是基于理论思辨的推导(吴耀华, 2011; 肖湘愚, 2011; 王英姿, 2010),几乎没有关于教育对志愿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二)工作及收入

工作是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方面。它不仅对人们的技能提出要求并且具有培养技能的作用,它还影响着人们如何打发空余时间的行动意愿(Wilson, 2012)。非全职的工作人群比全职的或没有工作的人群更具有志愿服务的意愿和行

为(Einolf, 2011)。

个体的工作性质对于其除工作之外的其他方

面具有“溢出效应”。例如,研究志愿服务的文献表明,个体职位的如下特征——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所具有的自主空间、技能导向型的工作——与个体志愿行为呈正相关,且对女性比男性的影响更加显著。

志愿服务对个体的职业发展也有诸多促进作用:它可以提升人们的工作技能、拓展社会交往渠道、使人们获得工作机会以及更好的职位、收获有偿工作所不能带来的满足感(Wilson,2012)。

收入是一个与教育和工作相关的变量,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地位或状态,从而决定了一个人的志愿行为。在美国,收入高于7.5万美元的人被请求参加志愿活动的比率是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人的3倍,此外,收入高的人与社区或社会事务的利益联系也更紧密(Wilson & Musick, 1997)。因此,在研究志愿行为时,收入通常也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指数。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收入越高的群体更愿意去尝试自我价值的实现,故而更容易产生志愿服务的意愿与行动。然而,志愿服务是一个贡献时间和精力过程,没有证据表明志愿服务会受到收入的显著影响(Wilson,2012)。有一些研究表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在志愿服务上的行为差异:大多数研究认为低收入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更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该群体能够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数量有限(Wilson,2000)。尽管有人认为收入对人们志愿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Lee & Brudney, 2009),但Pho(2008, p. 233)的研究表明,中低收入人群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相对较低,而中等收入人群中志愿服务是普遍受欢迎的行为。另外,低收入对人们志愿行为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有报酬的工作内容可以很好地激励低收入群体参加志愿服务(McBride, Gonzales, Morrow-Howell, & McCrary, 2011)。

与教育对志愿行为的影响的争论一致,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成本就越大(根据交换理论,人在决策之前会进行理性成本计算,志愿服务也不例外。因此,收入越高的人或者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加志愿服务的机会成本可能就越高),因此他们可能越不愿意参加志愿服务尤其是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内容(Wilson,2000)。有研究表明,对于那些按工作时长(以小时为单位)计算报酬的全职人群而言,工作

时间的长度与其志愿服务行为呈负相关,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便是经济收入(Wilson,2012)。

### (三)健康

诸多基于追踪数据的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与志愿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对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参加志愿服务的老人相比于没有参加志愿服务的老人身体更为健康,肢体更为灵便(Gottlieb & Gillespie, 2008)。还有的研究表明,志愿行为与人群死亡率的降低呈现负相关关系,与人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uoh & Herzog, 2002)。但是,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的身体健康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可能是人们通过志愿行为提高了身心健康,也有可能身心健康的人更容易投入到志愿服务的活动当中(Wilson,2000)。在国内的文献中,还没有具体分析健康对志愿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四)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人力资本以外,学者发现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也对人们志愿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Brown和Ferris(2007)发现个体的社会交往网络与对社会的信任度都会促使其参与捐款活动。而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社会规则等文化资本也影响着个体的志愿行为(Wilson & Musick, 1997)。

此外,研究表明,无论是参加志愿服务的比例、时长,还是在服务领域上,男性和女性均有比较显著的差异(Wilson,2000)。虽然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技能和资源,但是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因为较男性而言,女性具有更强的亲社会动机(Einolf,2011)。这在心理学领域关于性别角色研究中给予了解释,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通常代表两类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适应价值的特质。前者多指传统上用来描述男性在能动性(agentive)方面好的品质,比如独立、自信、有抱负等;后者多指传统上用来描述女性在集体性(communal)方面好的品质,比如善解人意、热情、乐于助人等。男性化特质通常有利于个人成就的实现,具有工具性特征(instrumentality),而女性化特质通常有利于和谐关系的构建,具有表达性特征(expressiveness)(蔡华俭,黄玄风,宋海荣,2008)。

年龄也是影响个体志愿行为的主要因素。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植根于过去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成年时期的志愿服务行为具有

重要影响,不同的年龄段,人们的志愿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Wilson,2012)。如果青少年时期在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和学校度过,感受到了来自父母和老师的呵护,看到了父母在志愿服务中的示范行为,那么人们在成年以后更愿意参加到志愿服务当中(Wilson,2012)。中年时期是生命历程中志愿服务的高峰期,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对人们志愿行为的影响很大(Smith,2010)。老年心理学家认为,志愿服务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效果(Gottlieb & Gillespie,2008),但是,人们是否退休对于其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我们通常所谓“志愿服务将填补退休人员工作角色上的缺失”的预期并没有实证数据来支撑(Wilson,2012)。

### 三、研究模型

基于以上对文献的讨论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用图1模型来分析公民的志愿行为,其中主要关注的解释因素是人力资本,模型中也包括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例如宗教信仰、社会网络、工作情况、居住情况、以及人口学变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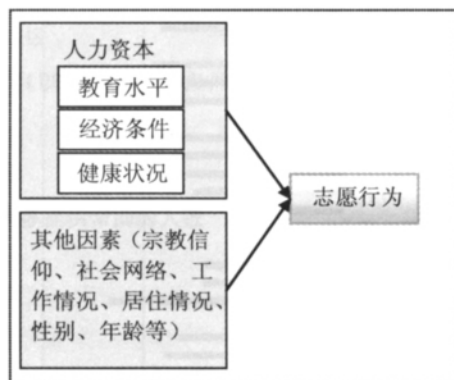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在该模型中,我们预期人力资本所包含的三个主要变量——教育水平、经济条件、健康状况——对公民的志愿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条件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文化资本的指标例如宗教信仰,社会资本的指标例如社会网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公民的性别、年龄、居住社区类型等,都可能与志愿行为呈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城市社区调查,被访

者居住的社区类型主要分为商品房、老旧小区、单位大院、保障房四种。居住在单位大院的居民更多地同属一个单位,更有可能受到来自单位的动员和组织,参加公益志愿活动。而居住在其他类型社区的居民则缺少来自单位或共同行动单位的动员和组织,因此参加志愿活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 四、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常通过大样本调查,从中收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信息,运用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变量之间的关系。大样本研究的优点是,相对于案例研究,其结论更具有推广性。此外,通过统计方法,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对其他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进行控制,因此更准确地反映出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一套当代中国公民公益行为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问卷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2011年8月至12月完成,覆盖中国27个城市、108个社区,包含有效样本5352户,共计14210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第一阶段共抽取27个城市,综合考虑了区域分布、人口规模 and 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因素。第二阶段在每个抽中的城市中抽取四个社区,分别为老旧小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数据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户面访。所收集的横截面数据包含了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收入与支出、公益行为与意愿、工作状态、以及健康状况等信息,本文主要用到其中与志愿行为和人力资本有关的变量。

### 五、变量描述

#### (一)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民的志愿行为,我们在问卷调查中请受访者回答如下问题:“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由公益机构、工作单位、社区、政府以及宗教团体等发起的志愿服务?”并通过回答的结果生成一个二元变量,其中有37%的受访者回答称过去一年当中曾参加过志愿服务,主要的志愿服务领域包括教育、环保、文体娱乐、医疗卫生健康、救灾、扶贫、助老助残、宗教等。

#### (二)自变量

对志愿行为的主要预测变量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三个主要方面:教育、经济条件以及健康状况。

由于每一个变量的各值间不等距,因此我们将各变量分别拆分成若干二元变量。其中教育变量包括“未受教育”(2%)、“小学”(8%)、“初中”(26%)、“高中”(32%)、“大专”(19%)、“大学及以上”(13%)。

关于经济条件的测量,通常有两方面,一是客观收入,二是对经济生活状况的自我评估。鉴于被访者来自不同地区,生活水准存在可观的差异,因此我们选择使用被访者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评测来测量其经济条件。在问卷中,我们请被访者回答如下问题:“鉴于您现在的需要和经济负担,您觉得您的家庭属于以下哪种情况?”34%的受访者认为自家的经济状况是“很富有”或“比较舒适”,14%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很困难”,另外51%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维持生活”。我们将该变量拆分成三个二元变量,分别为“经济困难”、“经济中等”、“经济富裕”。其中“经济困难”由答案中的“困难”和“很困难”合并生成,“经济中等”为答案中的“维持生活”,“经济富裕”为答案中的“比较舒适”和“很富有”。

以上问题是基于受访者对自身与他人的经济状况的比较。为进一步反映受访者的客观经济状况,我们请受访者回答如下问题:“过去一年中,你们家的收支情况是?”40%的受访者称自家有结余,43%的受访者认为收支基本相当,而17%受访者认为自家经济情况是收不抵支。我们将这三种情况拆分成三个二元变量带入模型。

对于健康状况,我们请被访者进行自我评价,32%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很好”或“非常好”,25%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好”,36%的受访者认为“一般”,另外8%的人表示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差”。我们将该变量拆分成四个二元变量,包括“较差”、“一般”、“好”、“很好”(由“很好”和“非常好”重新生成)。

此外,相较于一年前,1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更好了,64%的被访者认为与以前相比没有变化,而25%的被访者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更差了。我们把这三种选项拆分为三个二元变量,用作对之前的健康自评的变量的补充。

### (三)控制变量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受干扰,我们控制一些其他可能影响公民志愿行为的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宗教信

仰、户口、政治面貌、所居住社区的类型、就业情况、社会网络等。考虑到年龄变量与志愿活动的关系有可能是非线性的,我们增加了年龄平方的变量以获取非线性关系。

对于社会网络的变量,我们使用在被访者遇到重大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为其提供帮助的人数作为衡量指标,人数越多,说明被访者的社会网络越广,其社会信任度相对越高。

图2展示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在不同值的情况下,因变量值的百分比。从简单的二元相关的结果来看,主要的人力资本变量都符合我们的预期,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条件越好、以及健康状况越好的人越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然而,这样的二元相关结果并不可靠,需要对以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控制其他变量有可能会带来的干扰影响,从而对人力资本变量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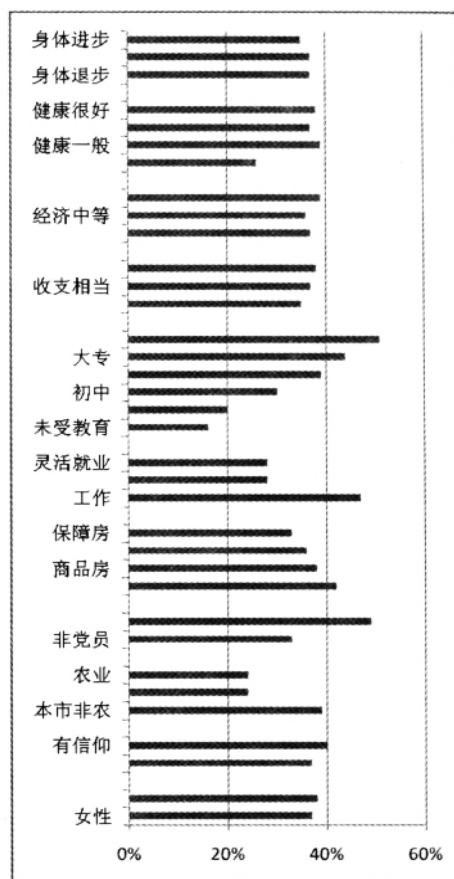


图2 自变量、控制变量各值对应的志愿行为百分比

## 六、统计分析

鉴于因变量是二元变量,本研究采用 Logistic

模型对人力资本因素对公民志愿行为的影响进行检验。其中各变量组中,“女性”、“无宗教信仰”、“本市非农”、“非党员”、“单位大院”、“无工作”、“小学教育”、“收不抵支”、“经济困难”、“健康较差”、

“健康较去年差”分别为参照变量。表1列出了模型检验的结果。鉴于 Logistic 模型结果中系数并不直接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我们在表1中还列出了自变量的影响概率。

表1 人力资本与志愿行为的 Logistic 模型检验结果

自变量	志愿行为			自变量	志愿行为		
	系数	标准误差	影响程度		系数	标准误差	影响程度
控制变量				教育水平(以“小学教育”为参照类别)			
性别	-.061	.070		未受教育	.061	.332	
年龄	.089***	.016	94.41%	初中	.329**	.155	7.64%
年龄平方	-.001***	.000		高中	.455***	.156	10.56%
宗教信仰	.264**	.110	6.17%	大专	.492***	.171	11.59%
户口(以“本市非农业”为参照类别)				大学及以上	.783***	.185	18.80%
外市非农业	-.537***	.171	11.17%	经济条件家庭收支(以“收不抵支”为参照类别)			
农业	-.510***	.143	10.73%	有结余	.233*	.137	5.33%
政治面貌	.484***	.083	11.33%	收支相当	.189	.122	
社区类型(以“单位社区”为参照类别)				经济情况自评(以“困难”为参照类别)			
商品房社区	-.330***	.092	7.31%	富裕	-.547***	.153	12.10%
老旧社区	-.280***	.093	6.23%	中等	-.439***	.130	9.93%
保障房社区	-.289***	.097	6.41%	健康状况			
就业情况(以“无工作”为参照类别)				健康自评(以“差”为参照类别)			
工作	.507***	.095	11.50%	很好	.158	.169	
灵活就业	-.221	.142		好	.196	.165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一般	.458***	.151	10.60%
	.072***	.016	43.46%	与去年相比(以“差”为参照类别)			
				比去年好	-.289**	.131	6.32%
				差不多	-.179*	.091	4.10%
				常数项	-2.951***	.447	
				伪 R <sup>2</sup>	.0764		
				观察值数量	4386		

注:影响程度是指当其他变量控制在平均值时,自变量从0变到1、或从最小值变到最大值,因变量的预计发生可能性的变化百分率。

\*  $p < .1$ ; \*\*  $p < .05$ ; \*\*\*  $p < .01$

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我们看到了与简单相关分析不同的结果。其中公民的教育水平对其公益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教育水平的升高,公民参加公益活动的概率也有所增加。例如,对于

一位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公民,其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比小学文化水平的公民高7.64%。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增加,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也在增长,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公民,其参与公益活动的

概率比小学文化水平的公民增加了 18.80%，该结果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人的社会认知有所改变，社会责任感增强，或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改善，人们接触志愿活动的机会越多，因而更有可能参与类似活动。

通常人们也认为，收入越高的人接触公益活动的机会越多，有更高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并且会更多地考虑对社会的贡献和回馈，因而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活动。然而这样的结论没有在我们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到完全验证。从经济状况的影响来看，首先，对自身家庭经济结余状况的评估为“有结余”的被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比收支不抵支的被访者高 5.33%（在 0.1 的水平上）；然而，评估为“收支相当”的被访者与收支不抵支的被访者在参与志愿活动的问题上没有显著区别。而对于自家经济状况与别人相比的评估，越是对自身的经济条件满意的公民，其参加公益活动的概率越低。自认为生活水平中等的被访者，其参加志愿活动的概率比自认为生活困难的公民降低 9.93%，而自认为生活优越的被访者，其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比自认为生活困难的被访者低 12.10%，该结果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以上发现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生活相对优越的公民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来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准或是迈向更优的生活水准，因此参加公益活动对他们来说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其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参加公益的概率越高，一种可能是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水平并不一定提高。通过对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自评两个变量的相关分析，我们看到，在公民的教育水平达到高中时，其收入水平达到最高水平，此后，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到大专和大学及以上，其收入水平的增长率有所回落。因此，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们参与志愿活动，即便其经济状况并不比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好。

在已有的研究中，健康状况是影响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模型检验结果来看，对健康状况的自评并没有与参与志愿活动具有显著的关系。只有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一般”的被访者显著地比认为自身健康“较差”的公民更有可能参与公益，其概率提高 10.60%。而认为自身健康“好”以及“很好”的被访者，其参与公益活动的概率比健康“较差”的被访者没有显著变化。

而在另一项指标中，对于自身健康状况与去年相比的评价，与被访者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并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认为自身健康状况比去年好的被访者，其参与志愿行为的概率比那些认为自身健康相较去年变差的被访者降低了 6.32%，而即便是认为自身状况跟去年差不多的被访者，其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也要比认为身体变差的被访者低 4.10%。身体状况变差的被访者反倒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对这个发现的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一种可能是被访者身体变差后，希望通过参与志愿活动来改善精神、身体状况。此前也有研究表明参与志愿活动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Gottlieb & Gillespie, 2008)。

最后，我们在模型中所采用的控制变量与志愿活动参与的关系，基本符合了既有研究的结论。性别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与志愿活动行为呈现显著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对于年龄平方变量的检验表明，年龄与志愿行为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个类似倒 U 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年龄增大，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增大，当年龄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有所降低。此外，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参加公益活动的概率比没有宗教信仰的被访者高，共产党员比非党员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显著提高，户口为本市非农业的被访者比外地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被访者更有可能参与公益活动，住在单位大院的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概率比住在商品房社区、老旧社区和保障房的被访者高。一种解释是单位大院因为仍属于单位管理，因此可能更易开展由单位组织的公益活动，同时单位大院的居民同属一个单位，更具有凝聚力，其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较高。这从社会网络的影响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越广泛的被访者，其参与志愿活动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另外，在职工作的被访者比没有在工作的被访者更有可能参与志愿活动。

## 七、讨论和结论

首先，就目前情况来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参与公益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这与现有的对外国公民的公益行为的研究发现类似。教育可以改变人们对社会和自身的看法，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对于社会发展的责任。随着全社会受教育人群比例的

增加,可以预见参加公益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其次,大多数对外国公民公益行为的研究都发现经济状况与公益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少数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公民由于参加公益活动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较少参加,这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通常人们预期,经济水平提高后,人们会逐渐脱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更多思考生活质量乃至生命意义的问题,因此也对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有更多的需求。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就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公民,其对待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支持度越高,对政治的兴趣越高,参与政治的程度也越高(Inglehart,1990)。然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人群较之低收入人群,对权威的支持度更高,对自由的支持度更低,其主要原因是变革对中产阶级的潜在成本比低收入阶层更高,因此

中产阶级更愿意维持现有的局面(Chen & Lu, 2010)。而我们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收入越高的阶层,对待公益的事情参与度越低,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个人和家庭上,而这个状况将有可能继续强化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使得公民缺乏能力来主导和推动社会变革。

最后,虽然对于公民的身体健康是否能够促使其更积极地参加公益活动,我们的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那些认为自己身体状况变差的被访者,更愿意参与志愿活动,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认为参与志愿活动可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反过来使人们更愿意通过公益行为来改善自身的身心状态。也只有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有能力去做公益。对于公民的健康和公益行为之间的关系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蔡华俭,黄玄凤,宋海荣(2008). 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基于中国大学生的检验. *心理学报*, 40(4): 474—486.
- 丁元竹,江汛清.(2001) 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李培林,张翼(2003). 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05):86—101.
- 苏方国(2011).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南开管理评论*, (03):122—131.
- 谭建光,周宏峰(2009). 中国志愿者:从青年到全民——改革开放30年志愿服务发展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1):76—81.
- 王博,叶边,金灿荣,等(2008). 救灾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世界知识*, 13:14—25.
- 王英姿(2009). 大学生志愿活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教育与职业*, (30):2—3.
- 吴耀华,张振刚(2011). 基于志愿服务活动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以广州亚运会志愿者为例. *思想教育研究*, (09):100—103.
- 肖湘愚,李茂平(2011). 志愿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2):158—161.
- 张银,李燕萍(2010). 农民人力资本、农民学习及其绩效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02):1—9.
- Brown, E. (1999). Assessing the value of volunteer activit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1), 3—17.
- Brown, E., & Ferris, J. M.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philanthropy: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6(1), 85—99.
- Bussell, H., & Forbes, D. (2002). Understanding the volunteer market: The what, where, who and why of voluntee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7(3), 244—257.
- Butcher, J., & Smith, P. (2010). 'Making a difference: volunteer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35(1), 27—36.
- Chen, J., & Lu, C. (2011).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3), 705—719.
- Cuskelly, G., Taylor, T., Hoye, R., & Darcy, S. (2006). Volunteer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volunteer retention: 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pproach.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9(2), 141—163.
- Duke, N. N., Skay, C. L., Pettingell, S. L., & Borrowsky, I. W. (2009). From adolescent connections to social capital: Predictors of civic engagement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4(2), 161—168.
- Einolf, C. J.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lates of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0(6), 1092—1112.
- Feldman, N. E. (2010). Time is money: Choosing be-



tween charitable activ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1), 103-130.

Gesthuizen, M., & Scheepers, P. (2012).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volunteer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xplan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1(1), 58-81.

Gottlieb, B. H., & Gillespie, A. A. (2008). Volunteering, health, and civic engagement among older adults.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La Revue canadienne du vieillissement*, 27(04), 399-406.

Gratton, L., & Ghoshal, S. (2003). Managing personal human capital: New ethos for the 'volunteer' employee.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1(1), 1-10.

Hank, K., & Stuck, S. (2008). Volunteer work, informal help, and care among the 50+ in Europe: further evidence for 'linked' productive activities at older ag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4), 1280-1291.

Haski-Leventhal, D., & Bargal, D. (2008). The volunteer stages and transitions model: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volunteers. *Human Relations*, 61(1), 67-102.

Inglehart, R. (1989).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e, Y. J., & Brudney, J. L. (2009). Rational volunteering: a benefit-cost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9(9/10), 512-530.

Luoh, M. C., & Herzog, A. R. (2002). Individual consequences of volunteer and paid work in old age: health and morta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90-509.

McBride, A. M., Gonzales, E., Morrow-Howell, N., & McCrary, S. (2011). Stipends in volunteer civic service: Inclusion, retention, and volunteer benefi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1(6), 850-858.

Pho, Y. H. (2008). The value of volunteer labor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2 through 2005.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4(2), 220-236.

Smith, D. H. (1981). Altruism, volunteers, and volunteerism.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10(1), 21-36.

Solinger, D.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ng, M. (2011).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4), 373-387.

Taniguchi, H. (2011). The determinant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volunteering: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4), 920-939.

Turner, B. S. (Ed.). (199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Vol. 24).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Wilson, J., & Musick, M. (1997).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694-713.

Wilson, J.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15-240.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孟大虎)

## Human Capital and Voluntary Behavior: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108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WANG Xin-song, ZHAO Xiao-p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f voluntary behavior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sector in China. This article, which is based on a nationwide surve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i. e. education level, 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conditions, and voluntary behavior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37%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voluntary activities in the past year. Among them, the better educated and healthier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se activities. The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citizens' economic conditions appear to ha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kelihood of engaging in voluntary activities. Better-off citizens are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activities. This phenomenon may be caused by increased opportunity costs for the better-off citizens. It might also mean that, despite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yet to grow.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voluntary behavior; education; income; health